

为了让毕业生更好就业

——各地高校“高招”扫描

■ 骆飞 赵旭 陈席元 许祖华 吴振东

为促进2022届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教育部日前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记者在北京、江苏、贵州等地看到,一些高校频出“高招”促进2022届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

线上、线下 信息更精准

连日来,贵州医科大学招生就业处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积极筹备于11月26日举办的“2022届高校毕业生冬季校园大型招聘会”,届时将有220家用人单位累计提供9900多个就业岗位。

就读于贵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理专业的汤昌旺是学校2022届毕业生,这段时间他一直在不断完善简历,对于学校26日的招聘会也很期待。“学校一直都在推送企业招聘信息,学院老师也经常关心我们的就业情况,指导制作简历。”

谈到如何更好做好学生就业工作时,贵州医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张红霞认为重在“精准”。“这几年,学校积极改变以往求职信息‘大水漫灌’的发布形式,强化就业信息化服务,力求更加精准。”她说。

为此,贵州医科大学开发了名为“蓝图”的招聘会报名小程序,学生在手机端能及时获取求职信息、投递简历等,犹如有了“求职小助手”。

西安交通大学26日也将举办2022届毕业生冬季大型招聘会。该校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服务中心主任郑旭红说,届时将有40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并且面向校内外学生开放。

据了解,西安交大建设了“高校精准就业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面向全国打通就业岗位资源,面向高校提供精准化、智慧化就业管理新模式,面向学生提供个人发展诊断、就业岗位推荐,面向用人单位提供精准化、智慧化的一站式就业管理服务。

在北京科技大学,有专门的视频面试间供毕业生使用。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吕朝伟说,根据疫情形势,北大及时将用于线下面试的房间全部改造为视频面试间,以专业的技术团队保障学生线上面试。

在西北大学,毕业生可通过线上投递通道或学校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设置的线下投递箱向心仪的单位投递简历,学校定期将纸质简历邮寄到各用人单位。西北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董国强说:“这种方式,学生参与热情高,用人单位反馈效果良好。”

指导、帮扶 服务更细致

记者发现,一些学校将就业指导关口前移,从新生入学就进行就业观教育。

“不能在招生的时候只谈招生,也不能到就业的时候才谈就业。就业工作是从学生踏进校门的那一刻开始的。”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冯锋说。

张红霞说,做好大学生就业工作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将学生就业创业指导工作贯穿于学生大学培养全过程,强化良好的专业观、学习观和就业观,“学校一直重视把学生就业

创业指导工作做在前面,从进校到毕业,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专业学生给予差异化指导。”

江苏海洋大学土木与港海工程学院2021届毕业生张帆告诉记者,今年临近毕业时一直没有落实单位,对就业没有信心。“我的指导老师在对未就业名单时发现我还没找到工作,一边找我谈话,帮我树立信心,一边联系适合我的工作单位,今年5月顺利签约,特别感谢老师和学校的细致辅导。”他说。

当前毕业生就业竞争激烈,部分毕业生在高就业预期与低就业薪资方面存在心理落差等情况,需格外加强引导。

“秋招开始以来,学校每周三都有求职季公开课,每周一个主题开展校内线下指导,同时还邀请校友、专业培训机构等对毕业年级学生在线指导。”吕朝伟说,学校的“筑梦工作室”还提供一对一就业咨询,缓解学生求职焦虑。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实施了就业创业导师库“双百计划”,即“校内100位导师+校外100位导师”,他们共同担任“就业经纪人”,为学生提供精准辅导,校外导师由创新创业专家、优秀创业校友、合作企业人士组成。

“我们结合学生需求,制作了电子就业台账,摸排未就业学生的就业状况和帮扶需求,针对他们关注的问题,分类型、分批次、分重点开展就业帮扶,进行问题诊断并提供建议方案。”吕朝伟说。

基层、西部 舞台更多元

谈到今年就业工作计划时,张红霞表示,学校将用好国家“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政



策,鼓励学生服务基层,服务西部。

复旦大学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坚持推动学生就业创业与国家战略需要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成长成才的多元舞台。复旦大学2021届毕业生中超过3700人次报名参加全国各地选调生及党政储备人才项目招录。

今年10月,江苏海洋大学新生开学典礼请来了2021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候选人王海洋校友。该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骆海宏告诉记者,王海洋两次进藏,投身脱贫攻坚一线,在他的影响带动下,该校先后有13名毕业生到西藏工作。

吕朝伟介绍,北大积极鼓励学生赴基层岗位工作,主动与贵州、黑龙江等省份对接,拓

宽毕业生服务基层的择业渠道,并在学校积极承办相关考试,引导优秀毕业生广泛参与。

为促进毕业生赴基层、中小企业就业,陕西省教育厅还联合陕西省工信厅、陕西省人社厅等部门组织开展中小企业“百日招聘”高校毕业生活动。同时,主动对接全省县域工业园区和现代农业产业需求,帮助毕业生在省内中小企业就业。

“我们充分发挥校企合作机制对就业的‘压舱石’作用,应用化工技术等7个专业与扬子巴斯夫、中科聚合等企业签约共建15个现代学徒制订单班,380多名学生进班就读,让他们搭上‘就业直通车’。”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徐拥军说。(据新华社)

人才增长最多十大城市盘点：上海第一，深圳第二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人才对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日益增强。

近十年来,各地人才总量有何变化?增量人才分布有何特点?

记者梳理分析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口超500万的省会城市以及GDP过万亿的普通地级市、制造业大市东莞等35个城市的数据。在35个城市中,十年来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量最多的是上海,深圳、成都、北京、广州紧随其后。从人才密度(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增量看,上海增加幅度最大,深圳、北京、杭州、郑州紧随其后。

4城增量超300万

衡量一个地区的人才集聚情况,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是重要指标。

在35个城市中,2020年人才总量(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重庆、武汉、西安、天津、郑州。前八个城市人才总量均超过400万人。这些城市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多,有几个因素:一是城市本身人口多,都超过了1200万,其中,前6个城市人口总量都超过1700万;二是,这10个城市中,大多数拥有的高校

资源多。例如,位居第七、第八名的武汉、西安两个城市高教力量雄厚,高教资源和实力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五名。

35个城市中,人才总量最少的3个城市分别是东莞、南通和泉州。这三个城市都是位于沿海地区,以制造业为主的普通地级市。这些城市传统制造业发达,产业工人比较多,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总量,比例相对都不高。

从十年总量变化看,上海、深圳、成都、北京、广州、重庆、西安、郑州、杭州和武汉位居前十,既包括了四大一线城市,也包括了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

十年来,有四个城市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增量超过300万人,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和成都。上海十年增加了337.11万人,位居第一。上海拥有大量跨国企业,以及上证所等金融机构,总部经济、研发创新等十分突出,吸引了大量人才集聚。此外,长三角是我国最大、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群,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上海对长三角、华东地区、长江经济带、中原等地的人才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记者对33所高校2019届毕业生去向统计发现,上海的名校毕业生留在上海的比例很高。其中,上海财经大学为76.74%,上海外国

语大学为76.57%,上海交通大学为73.47%,复旦大学为72.75%。

深圳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了328.69万人,位居第二。从常住人口变化看,深圳十年增量达到713.65万人,增量在各大城市中领跑,十年增幅达到68.47%。

人才增量和人口增量

值得注意的是,将人才增量前10位的城市单列,比较人才增量和人口增量发现,京沪这两个强一线城市的人才增量明显大于人口增量。比如,上海十年来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了337.11万人,但常住人口增量只有185.17万人;北京十年来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了301.3万人,但常住人口只增加了228.07万人。

深圳、广州这两个一线城市以及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人才增量均远小于人口增量。深圳的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量为328.69万人,但常住人口增量高达713.65万人;成都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量为301.47万人,常住人口增量达581.49万人。

京沪两个超一线城市城区人口规模大,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问题,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两城人口

在2014年前后达到高峰后,2015年以来增长缓慢。在这个过程中,大量非核心产业转移到周边地区和新一线城市。在纾解非核心功能后,京沪的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和调整,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高新产业发展加快,而这些产业集聚的高端人才更多。

广州、深圳虽然也是一线城市,但原本人口规模比京沪小很多。近十年来,广深以及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城市仍处于人口快速集聚阶段。这些城市不仅有现代服务业、高新产业、新兴产业,而且也还有大量对学历要求不高的传统产业。因此,这些城市人才增量明显低于人口增量。

人才密度变化

将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作为人才密度来看,人才密度提升最快的5个城市是上海、深圳、北京、杭州、郑州。

其中,上海十年来每10万人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了11979人,人才密度提升幅度位居全国第一。提升幅度居第二位的是深圳。在大量人才流入下,深圳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上升到28849人,超过广州,成为广东人才密度最高的城市。

北京每10万人口大学文化程度人数提升了10481人,提升幅度位居第三。新一线城市则杭州提升幅度位居第四,为10436人。

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省会郑州的提升幅度位居第五,增加10047人。这与近年来河南快速城镇化有关,大量河南的大学毕业生在郑州就业。与此同时,郑州是河南的高教中心,集聚了一大批高校,2020年郑州拥有普通高等学校65所,招生38.8万人,在校学生116万人,增长7.6%,在校数量仅次于广州,位居全国第二。不过,论高教综合实力,郑州和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还有一定差距。郑州的高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职大专类高校。

在榜单末端,制造业大市、民营经济大市泉州的提升幅度最小,每10万人大学文化程度人口仅增加4789人。此外,类似东莞这样的制造业大市,提升幅度也比较小。

作为福建经济第一大市,泉州高新企业数量仅为1037家。厦门大学经济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比如,泉州的鞋帽、纺织服装等产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不是很大,加上这些产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特别多,因此大学文化程度占比较低。(林小昭)

成都跻身超大城市行列,昆明、长沙、大连、哈尔滨成为特大城市——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再次扩容

中国有哪些超大、特大城市?这些城市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显示中国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再次扩容,包括国内7个超大城市和14个特大城市。这些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今年以来纷纷交出亮眼答卷,其中多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

超大特大城市又添新成员

什么样的城市才算“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国家统计局解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城市规模按照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进行划分: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人以上、1000万人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各城市城区人口数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标准时点(2020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数。

此前,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19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已有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等6座超大城市,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等10座特大城市。

根据“七普”数据,此次特大城市“俱乐部”又添4位新成员:昆明、长沙、大连、哈尔滨等4座城市城区人口均超500万人。同时,成都以1334万人的城区人口跻身超大城市行列。此外,武汉以995万人的城区人口居超大特大城市榜单第8名,距超大城市“资格”仅差5万人。

超大特大城市“俱乐部”何以一再扩容?

“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人口迁徙是重要原因。“六普”到“七普”的10年间,大量年轻人涌入超大特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近年来,各城市为吸引人才工作,定居,展开“抢人大战”,各种诱人的落户政策令人目不暇接。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为成渝“双城记”谱写新篇章定下基调,也增强了许多年轻人在这发展的信心。“古人说‘少不入蜀’,我倒认为成都这座城市也很适合奋斗。身边不少年轻人因喜欢这里的生活节奏和发展机会而来。”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发展的27岁成都青年柴韵说。

“年轻人选择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会给选择她的年轻人带来惊喜。”柴韵相信,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将迈上更高台阶。近年来,随着成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对西部“双子星”人口规模、经济总量持续攀升。截至10月底,2021年川渝共建的67个、总投资1.57万亿元的重大项目已开工数量达64个,累计完成投资1866.8亿元。此次成都继重庆之后迈入超大城市行列,在多数人预料之中。

深圳东莞“年轻”,京沪老龄化程度较高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不仅是一个头衔。一方面,城区常住人口数量是城市发展建设的一个重要“门槛”。据了解,根据有关规定,目前申报建设地铁的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应在300万人以上。同时,按照住建部、应急管理

规定,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另一方面,超大特大城市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此前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及其他超大特大城市经济大幅增长、人口显著增加,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

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结构对城市未来发展影响深远,备受关注。

哪些城市最年轻?“七普”数据显示,深圳、东莞两城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5%左右,明显低于其他超大特大城市。

哪些城市“银发族”最多?看60岁以上人口比例,北京、上海这两座一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3.38%,在各超大特大城市中排名第二;北京60岁以上人口占比也接近两成。同时,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20%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大多位于北方,其中东北地区的大连居首位,哈尔滨、沈阳60岁以上人口比例也均处于较高水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析,生育率较低是导致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首要因素。此外,超大特大城市较高的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吸引了老年人随子女落户,劳动力人口流出也导致部分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分析人士指出,超大特大城市有机会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其中,一线城市需

要注意成本和服务。宁吉喆介绍,当前各一线城市在养老、社保方面总体水平较高,人均期望寿命均在80岁以上,在各类城市中名列前茅,“需要改进的是控制成本,改善服务”。

“在控制成本、改善服务的同时,也应注意不同城市之间养老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陆杰华表示,在一线城市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养老金水平和老年人收入较高,年轻劳动人口流入很大程度上对冲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养老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互济性强。与此同时,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部分特大城市年轻人口流入较少,与前者相比“更老”“老得更快”,养老服务供给水平与人口老龄化进程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为此,应推动不同城市间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更趋均衡。

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核心竞争力

不仅吸引人口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在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成都这7个超大城市GDP均超过1万亿元。其中,上海GDP率先突破3万亿元,为30866.73亿元。北京前三季度GDP为29753.0亿元。预计两地全年GDP都有望突破4万亿元。

14个特大城市,绝大多数前三季度GDP达到5000亿元以上,其中长沙这一特大城市“新成员”前三季度GDP为9586.98亿元,已接近万亿元门槛。

“十四五”期间,如何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宁

吉喆介绍,相关规划部署有以下要点:

——促进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包括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转变开发建设方式,加强城市治理风险防控;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强化超大特大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更好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

——合理降低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有序疏解中心城区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和设施以及过度集中的公共资源,加强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

——优化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核心竞争力。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率先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提升综合能级与国际竞争力。

陆杰华认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仅源于规模扩张,也来自结构优化、内涵提升。”他表示,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科学规划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各类设施和功能的空间分布,在合理降低人口密度的同时,着力提升人口素质;另一方面,要发挥好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使之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格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汪文正)